

## □ 六六

我本来答应公司写电影剧本的,但自从两年前看过蒋雯丽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我们天上见》,便搁浅了这个计划,她让我感到自卑。

我觉得好的电影是一次心灵愉悦或者洗礼的过程,而《我们天上见》显然符合这个特质。我写不出这种格调的电影剧本,它很清新、雅致,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打动你。故事讲得几乎没有任何高低起伏,不具备任何戏剧元素和张力,但看完电影你却忍不住泪流满面。

作为导演,她拍得比顾长卫好;作为编剧,她写得比我好;而且她还能演……当时看了《我们天上见》,我的第一感觉是,从此电影行业的门又在我面前关上了。蒋雯丽所拍摄的画面像极了一幅山水,极美,极干净。

跟她这个人特别像,让你觉得舒服、温暖、优雅、自然。

我很赞叹,一个女演员有这样的个人修养。

相比较于我,她不浮华,不热闹,我的文字看起来浮浮华华、热热闹闹的,她非常平实,但她的平实又让你觉得增一分太艳丽,少一分太苍白。

由《我们天上见》剧本改编之后的新书《姥爷》,再一次打动了。她对文字的感觉非常好,分寸拿捏得极其到位,那种伤感,是甜甜的;那种喜悦,是清香的,非常微妙。一个女人这样成功,又有演员这样华丽的职业,但她却永远安静、妥帖,能照顾到他人的情绪,又不表现自己。这种修养,极其难得。

在《姥爷》一书中,蒋雯丽写出了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依偎感和扶持感。姥爷可敬、可爱,对童年的蒋雯丽无比宠溺,既照顾她生活的点滴,又严格地管教她。书中的许多细节,让我动容。中国与西方相比,亲情更浓,常常几代同堂共同生活。我猜想,中国的这种儒家文化和亲情的关联,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如果你想理解中国人对幸福的含义、对家的理念,可以来看这部电影、这本书。

而我小的时候,一有机会就想逃离我的家,越远越好,最好好几年都不要回来。如果不是被逼无奈,我简直连电话都不想打。那时我常跟自己说,我永远不要过这样的生活——失去自我,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老了以后忙着孩子,我要过自己的生活。我总是想把自己放大,要自己的空间,要自由。

有段时间我生活在海外,居住了大概十年,可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居然开始想要把家搬回来,和父母同住,彼此照应。因为后来我发现,我想要的自由,就是情愿不自由。现在的我特别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拴在家里,为我所有的亲、爱的人服务。

我觉得中国人的亲情很奇怪,这种依赖关系始终是割舍不了的。可能中间有阵子它会断裂一下,像叛逆期一样,但终究它会接回去。如同基因,到了一定的时间会被激活。

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已经浸入我们的血液,很难分割。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绝不是“我得到”是一种快乐,而是“我奉献”是一种快乐。

我的快乐是与周围亲人、朋友的快乐相关联的,我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的成就、金钱而快乐,反而到了我这个年纪,花在自己身上的很少,花在周围人身上的很多。再广泛地延伸一点,甚至是跟陌生人分享。亲情,是中国社会的纽带,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全都融入在这部电影里、这本书里。

我觉得蒋雯丽的文字,就是那么直接地、简单地告诉你这个道理:你的幸福是跟你身边的人息息相关的,你因为爱他们,愿意做各种各样的妥协和牺牲。

李勇慧博士的学术专著《一代传人王献唐》,是王献唐研究领域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是一项具有重要开拓意义的新成果,值得学术界高度关注。该书是在李勇慧的七十余万字博士学位论文《王献唐研究》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这只是她关于王献唐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就这部书而言,可以说达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高度,在该领域研究进程中有巨大的学术拓展,称得上是这一领域的里程碑。

这样说的理由,首先是研究对象——王献唐是一位文化学术史上的巨人,值得研究。献唐先生是20世纪前半期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在哲学、古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图书文献学以及书法、绘画、建筑各个领域,都达到了一流水平。他是山东省图书馆历史上最具影响的馆长,也是山东省博物馆的创办人之一,曾兼任齐鲁大学中国文学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与屈万里、李义贵共同将馆藏图书文物之精品运往曲阜与四川保存,历尽万难,最后完整地运回山东。因此,献唐先生不仅是一位国学大师、著名学者,而且是一位文化事业家,在山东文化史上做出了不朽的业绩。

第二点是网罗的第一手资料极为丰富。对于已经发表的论文、著作、王献唐的遗著,全都已经掌握。对于与王献唐相关的日记、杂志、论著、考古报告,也都收集齐备,而对于未发表的《王献唐日记》手稿数十册,也基本上研究一遍,仔细勾勒出其中有用的材料。至于散藏在山东省档案馆、曲阜文管会、武汉大学、青岛档案馆、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的档案近200件,也尽力搜集并逐字进行了阅读研究,可以说是巨细不遗。从本书卷首的53幅珍贵照片,完全可以领略到作者掌握文献的形形色色,令人兴趣盎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这部著作之所以具有巨大拓展意义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点是对相关人物的采访。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但凡与献唐先生有一丝关系,直接的或间接的,李勇慧都设法请教,其中献唐先生的儿媳安可苻女士、文孙王福来先生,孔德成、屈万里、李义贵、董作宾等先生的亲属,山大王绍曾先生、台湾丁原基教授以及山东省文博系统、图书馆系统、高校系统、收藏界等方面的师友,走访面很广,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对纸面材料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如关于献唐先生的出生年月日,除了利用先生自填表格、家谱稿本外,还有安可苻女士的讲述,其结论也就具有权威性。

第四点是作者对材料分析透彻,理解准确,研究方法科学,结论富有创新意义。《一代传人王献唐》这部书篇幅较大,但章节安排有条不紊。由于面对大量原始材料,其间甄别取舍颇具难度,但作者对材料消化充分,所以表述清楚,富有条理。由于王献唐先生经历了由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社会转变,家庭和个人经历也比较复杂。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的烈属,长子王振华、儿媳黎雷霖一家都被国民党杀害于重庆白公馆狱中。他本人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职,在国民政府的交往也十分广泛,因而把握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有相当的难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这方面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又抓住了献唐先生作为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本质,没有夸大,也没有改造,真正从科学研究自身的规律出发,使这部著作的基本观点具有科学性,因而也就具有了长久的学术生命。

本书的绝大部分材料和结论都是全新的,这就决定了该书是一部经得住考验的优秀学术专著。献唐先生身处中国历史上极为动荡和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期,治学范围既广,治学成就亦高,交游满天下,知者无不叹服。因此,《一代传人王献唐》不仅是对王献唐个人的研究,也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其学术贡献远不限于王献唐先生一人而已。希望其他有关成果,尤其是《王献唐年谱》早日问世,为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参考史料与研究佳作。

## □ 杜泽逊

## 【闲读随笔】

## 观念的冒险

## □ 周鲁霞

“哲学的功用是缓慢的。思想往往要潜伏好几个世纪。”当英国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写下这段文字之时,并不意味着对哲学、思想的悲观或否定。恰恰相反,怀特海“自始至终强调的一个观点便是:要提高和保持文明,冒险是很重要的”。怀特海所说的“冒险”,主要是“观念的冒险”,他认为,在人类文明的缓慢演进过程中,观念之作用不可替代,正是“观念的冒险”,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原动力。

怀特海曾以奴隶制的废除为例,说明观念的作用和把观念坐实之漫长艰难。奴隶制在古希腊就存在,以古罗马帝国时期最为典型,但直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后才被从法律上彻底废除。最初,奴隶制被视为“天然”,没有人认为它不合理,即使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一些杰出的政治领袖仍在家中蓄奴。最先撞击奴隶制这一“天然”而“合理”巨石的,是并不坚硬的观念,如流水滴石、鸡蛋碰墙,着实是一种冒险。公元前300年左右,斯多葛学派最先提出了平等的观念,对奴隶制发起挑战,该学派认为,所有的人——无论其出身、种族、财富、地位如何不同——都受同一个自然法的支配,作为个体他们是平等的,这一平等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奴隶。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塞尼卡认为,奴隶制在伦理上是不道德的,人们应该按照由己推人的方式,把奴隶作为平等的伙伴、朋友。所有这些虽然仅仅是一种观念,却是影响、推动社会变革的契机。怀特海认为,这些重要的冒险的观念,最初“出现在一小群天才人物的头脑中”,它对社会造成的影响非常之小,却是“新生活制度的微弱曙光”。继斯多葛学派之后,人道主义的精神、人类基本权利的观念、民主的观念等一次次观念的冒险,不断冲击着奴隶制,历经千年,方水滴石穿。在怀特海看来,实现从奴役到自由的转变,“哲学贡献了一般观念,法律贡献了建设性的能力,宗教提供了道德力量”,观念的冒险则是所有一切的开始。

关于生态,人类同样也经历了一个观念演变的过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个观念、哲学问题。人类早期,社会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系统。古希腊哲学的主客二分把自然作为沉思默想的对象,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人与自然分离乃至对立的肇始。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是小写的人逐步演变为大写的人的过程,人的理性精神不断强化和确立。大致上,从十七世纪开始,人类开始进入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以科学和理性为标志,代表性人物是法国的勒内·笛卡尔(1596-1650)。作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始祖、哲学的奠基人的笛卡尔,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他为人类争取了理性的权利,却把动物看成机器,在他看来,自然就是一台没有生命和价值、上满发条的宇宙机器,动物的悲鸣或哭泣与没加润滑油的机器发出的噪音没有区别。“现代人”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看做人的经验,感觉甚至征服的对象,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歌猛进,自然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理性的自负和狂妄不断增长,对自然的轻蔑也逐步升级。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人类一系列的“征服”、“胜利”之后,“收获”的是残酷无情的惩罚。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虽话语独霸,但不同的发声、观念的冒险从来没有停止过。苏格兰启蒙学派的大卫·休谟(1711-1776)就对理性的局限、人性的弱点——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提出尖锐、系统的批评,他认为:“人类理解力的褊狭疆界会给人类社会造成无穷的混乱,如果不受某些普遍的不可更改的原则的限制,人类的贪心与偏见会很快使世界陷入混乱。”较休谟晚些时期的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曾调侃:“人无疑可以撒籽种树,以嫁接使之优化,以百般修剪使之美化;但他从未想过能够制造一棵树。”——此语尖锐地道出了在自然面前人是何等的渺小,是对理性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警醒。

《生态文明和环境立法》(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书是刘爱军先生多年来对生态文明倾心研究的结晶,虽出版于十年前,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很重要一点就是体现了一种观念的冒险。作者是在“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生态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对环境破坏听之任之,麻木不仁”的大背景下,就开始关注、思考、研究生态问题的,其间当然经历过不被理解乃至误解,这既需要思想的敏锐,也离不开道德的勇气。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作者对生态文明问题形成了成熟的、系统的认识,具备了很强的学术自信,从2004年开始就不断呼吁把生态文明理念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写入党章和宪法。欣慰的是,党的十八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以重彩、单独成篇,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党章修正案也增写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这其中,无疑也凝聚着作者的一份智慧和贡献。



《姥爷》  
蒋雯丽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 蒋雯丽的文字远比我好

## 【温馨读本】



《一代传人王献唐》  
李勇慧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 王献唐研究的重要拓展

## 【研究著作】

## 微博书评

◎必读呢本:《被贬低的思想》主要从文学批评和历史叙事着眼,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谈论的对象有鲁迅、巴金、胡适、昆德拉、克里玛、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红色戏剧与极权美学以及中国与东欧知识群体,围绕当代人的存在困境和争论予以思考,试图通过理性和感性的结合,表现出个人的思想和阐释风格。

◎阿紫巫婆:古人推崇“知行合一”,意为以知导行,考验一个人的修为之高低。近来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及高晓松的《如丧》,概叹“知生死而晓大义”,凡事皆可淡然处之。对世事愈洞察,愈知人心之高低,愈不为外界周遭事物所影响,这就是所谓的“波澜不惊,水波不惊”吧。

◎深圳小刀:《怒目少年》是王鼎钧回忆录之二。流亡,求学,艰难而孤独地成长。“洞明世事达人情”之后,回头细看当时少年,家事国事天下事,探隐发微,举重若轻。书中写疾疫与虱虫一段,令我记起自己的中学时代,现在才明白,其时种种,无非是贫困二字。无论如何曾经少年,“没关系,只要你长大”。